



日本的中国学方法论

王勇

来源: 《中国语文学的研究方法论探索》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 投稿人: 王勇 发布时间: 2008-6-6 阅读次数: 713

嶺南中國語文學會“中國語文學的研究方法論探索”國際學術大會
韓國·大邱 嶺南大學校 國際館 2003年10月18日

日本的中國學方法論

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 王 勇

作為專事日本學研究的中國人，對日本的中國學研究動態不能不予以關注。尤其在傳統文化領域，無論中国的日本學還是日本的中國學，往往使用相同的文獻，涉及類似的主題，“知己知彼”是為治學之要。

大概因為上述原故，探討日本中國學之歷史與現狀的重要著作，幾乎多出自精通日本學的中國學者之手。比如，北京大學嚴紹盪教授的《日本中國學史》（第一卷）（江西人民出版社，1991），系統梳理千餘年來日本中國學發展變遷之軌跡；再如，臺灣大學高明士教授的《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》（明文書局，1986），敏銳捕捉現代日本中國學研究的動態。俗話說“旁觀者清”，這些鳥瞰全局、冷靜透視的宏篇鉅制，處於局内的日本學者不太好執筆，疏於外語的純中國學者也無法勝任。

今天有機會與韓國的中國學專家交流，在中國時感到高興，到了韓國便忐忑不安了。因為，說好聽點是“旁觀者”，說難聽點就是“門外漢”。因此我要做這些鋪敘，一是為今天“不速之客”的身份尋找藉口，二是為接下來的“信口開河”預埋伏筆。

1. 日本的漢學與中國學

縱觀日本的中國研究史，大致可以明治維新為界，分成前後兩個階段：前期稱作“漢學”，在江戶時代達到鼎盛；後期才叫“中國學”，一直延續至今。從嚴格意義上講，“漢學”既是中國學也是日本學，或者說兩者兼有，明治以前的日本人是作為本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進行研究的。

明治維新以後，在“脫亞入歐”的風潮下，日本經受“歐風美雨”的洗禮，文化結構發生變異，西學從某種程度上替代了漢學的角色，漢字負載的文化受到疏遠和異化，逐漸衍生出“中國學”的新型學科。

日本把中國作為外在的客觀對象，進行真正科學意義上的研究，無疑肇始於明治時期，並在大正、昭和時期趨於成熟。那麼，新生的“中國學”究竟有何特點呢？

2. 傳統的研究方法

有些學者在論述日本的“中國學”時，著意強調其新生創意的側面，而忽視其繼承舊學的特點。其實，活躍於明治、大正時期的大多數學者——無論是西學家還是國學家，均具有深厚的“漢學”功底。

從明治四十二年（1909）至大正五年（1916）刊出的《漢文大系》20卷看，執筆者如服部宇之吉、兒島獻太郎、重野安尋、星野恆、長澤規矩也、牧野謙次郎、安井小太郎、島田鈞一、岡田正之諸人，治學走的是考據學的路子。即使到了內藤湖南、青木正兒、小島祐馬、武內義雄這一輩，依然有“漢學”家的遺風，學問講究博廣、會通，“經史子集”皆所涉獵，不像現代學者那樣局囿於某個專題。

昭和以後，學問日趨細化，專業越分越小，在這樣的環境下很難再產生“通儒”，但清朝以來的考據學風，仍然扎根於日本的學術土壤。就以我熟悉的當代日本學者而言，史學如池田溫先生，哲學如戶川芳郎先生，文學如佐藤保先生，他們注重收集資料、精讀原本，拘泥字句，考證入微，擅闡釋而少發揮，即《論語》“述而不作”之傳統也。

日本的中國學研究，重視原典、精於考證的學風，一般認為是受清朝考據學影響，事實上也不盡然，與日本人嚴謹、求實、保守等國民性關係密切。清初山井鼎、物觀的《七經孟子考文補遺》200卷傳入中國，其參校諸本、羅列異同、不抒己見的作風，對“乾嘉學派”震動巨大，某種意義上促進了清朝考據學的發展。這種學風不限於中國學，周一良先生評松本清張的偵探小說，就說其手法類乎清朝考據學，中國學者反而逐漸疏於此道。

3. 日本的“團隊”精神

日本的中國學研究，還有一個源於其國民性的特點，便是所謂的“團隊”精神。一涉及到這個問題，我們很快聯想到“東京學派”和“京都學派”，前者以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為根據地，後者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為大本營。

形成某個學派，需要“團隊”精神。以前中國是靠師承關係形成學派的，但在現代社會中這種關係較難維繫，像中國某些名牌大學那樣，宣稱自己的博士生不能留在本校，顯然阻止以師承為紐帶的學派形成。

日本的中國研究學派根基何在呢？師承當然很重要，日本一些著名大學實行講座制，一個學科設置一名教授，他對聘任副教授、講師、助教有很大的發言權，久而久之自然形成學術團體。比如京都大學吉川幸次郎教授翻譯《水滸傳》十幾年而未竟，下任教授清水茂教授接其舊業，二代人成就一項事業，形成《水滸傳》研究的一個基地。

不過，我認為在日本形成“學派”，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的研究方法，即所謂“講讀”、“會讀”、“演習”之類。“講讀”由某位先生主持講授，“會讀”是大家共同研讀某部重要典籍，“演習”則由學生分擔發表。這是利用集體力量治學的方法，也是某個學派形成的基礎所在。

舉例說，京都大學開設的《毛詩注疏》、《論語注疏》等經書注疏的“講讀”、“演習”，從1928年延續至今，約80年間不曾停止，所出的成果均凝聚著集體的智慧。我們不得不承認，日本中國學的很多重要成果，均是團隊合作的結晶。日本的一些學者，個人並沒有驚人的成就，但依然被奉為宗師，其原因就在此。

4. 西學的影響

前面提到，日本的中國學誕生在明治時期，必然帶著那個時代的印記，即受西學東漸的影響。這種印記和影響，體現在多個層面。首先，就如東京大學“東洋文化研究所”的名稱所示，“東洋學”作為一門新興學科誕生了。這個術語雖然是英語Orientalism或Oriental Study的對譯，但含義卻與英語不完全對應。Orientalism或Oriental Study涵蓋整個東方研究，但日本的“東洋學”不包括日本，僅指日本以外的東亞諸國。中國語中的“東洋”、“東洋人”、“東洋貨”專指日本，而日本的“東洋學”卻排斥自我，這是明治維新時期“脫亞入歐”造成的結果，當時日本一心躋身西方列強，不願與亞洲各國為伍。現在日本許多大學開設“東洋史”專業，自然也不包含日本史。總部設在日本的國際東方學會，繼承了“東洋學”的傳統，主要研究中國，兼及韓國、越南等。

其次，1888年內田周平出版《支那哲學史》，標誌傳統的“經學”搖身一變成了“中國哲學”。這個變化顯然是在西學刺激下發生的，日本古典之重要組成部分的“經學”，變為與“西方哲學”、“印度哲學”並列的外國學問，負面影響是割裂了日本傳統文化的經脈，正面影響是促進了客觀的科學研究。

再則，在西方學術思潮衝擊下，部分學者得以擺脫傳統的思維框架，從更高的視點關照東亞文化。茲以中國歷史分期為例，上個世紀初內藤湖南提出著名的“三分法”，即以漢末之前為“古代”，三國至唐代為“中世”，宋代以後為“近世”。這種歷史分期模仿歐洲的歷史分期，雖然與日本歷史的分期對應，但與以清末之前統括為古代的中國目前流行的斷代不相吻合。

5. 日本中國學的局限

綜上所述，日本的中國學既不同於中國的中國學，大概與韓國的中國學也不盡相同，既有傳統的一面，又有西化的一面，是非優劣難以評說。日本的中國學雖然有不少值得借鑑之處，然而其局限性也是有目共睹的。

首先，日本的中國學專業細分，不少學者終身只埋頭研究某人、某事、某作品，對相關學科缺乏必要的了解，微觀考證之精神可嘉，高屋建瓴之氣度不足，以至視野狹隘，在理論構建上罕有建樹。

其次，日本的“團隊”精神雖然有利於基礎性課題的操作、後繼人才的培養、研究成果的積累、學術思想的傳承，但同時也伴隨抹煞個人獨創精神的弊病。日本大小不等的“學派”，有時會成為封閉割據的“學閥”，在圈內稍有出軌很可能遭到排斥。比如，你一旦在某位教授的退官紀念文集上發稿，很難再向其他私淑的先輩學者呈獻紀念文章了。這有悖於學科交叉、學術國際化的趨勢。

再則，日本頂尖的中國學大家，不會說漢語者為數不少。日本有訓讀漢文的傳統，所以治中國學者，多有深厚的閱讀理解古代漢文的功底，然而這也妨礙了他們學習活生生的交際語言。我曾經邀請過多為著名的中國學家講學，中文係、歷史係的教授久聞其名，便慕名前來交流，結果語言不通，採用最典型的、古老的東方式交流手段——筆談，極大地降低了這些名家的聲譽。

總而言之，日本中國學的研究方法，既繼承了東亞學術傳統的特點，也吸納了西方學術的思路，形成了符合其國民性的風格。然而，在傳統和現代、漢學與西學的交融組合中，也有不太合理的部分。